

編後語

作為大規模的社會實踐及其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是在近代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這一近代事物卻植根於人類諸多文明中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即對眾生平等的熱切期盼和孜孜以求。在中華文明中，這一傳統異常豐沛，並在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中得到了不同的表達。兩漢之間王莽新朝的施政，為諸多擺脫了中國正統史觀的近代史學家們視為人類文明第一次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實踐。

當然，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實踐發生在二十世紀，並且主要出現在兩大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國家：俄羅斯和中國。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要線索，就是社會主義從西方傳入中國，並且滋養了兩大具有高度本土性的革命思潮：三民主義和毛主義。然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社會主義實踐在二十世紀末期土崩瓦解，到今天只是在個別之地苟延殘喘。的確，二十世紀見證了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衰落。

儘管如此，「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能夠打動人心的理念。在中文世界，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都有留戀或頌揚社會主義的無盡文字。那麼，「社會主義」對於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到底還有甚麼意義？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二篇文章，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視角來討論社會主義的命運。李敏剛和周保松的文章，借助對科恩(G. A. Cohen)晚年一部重要著作的評述，探究了社會主義的道德生命力。科恩是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期最具有影響力的西方代言人，他試圖通過重建社會主義的道德哲學基礎來重振其雄風。科恩彷彿找到了兩大基石，這就是機會平等原則和社群原則。然而，正如李、周之文所述，科恩的機會平等原則已經失去了社會主義的獨有色彩，同自由主義的理念基本沒有甚麼差別了，而他對社群原則的論述又極為不充分。

實際上，科恩以野營旅行為例，展現了社群原則的一些基本內容，並且期待着社群原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令他憎惡的市場交易原則，來主宰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秩序。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實踐，應該是建立在社群團結與自治基礎之上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然而，這一理念一旦落實，其虛妄性和災難性，在邏輯上已經有若干經濟學家給出了證明，在實踐中也已經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改革的悲劇命運加以展示。

社會主義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偉大實踐，在王莽時代是短命的，而在二十世紀也沒有可持續性。因此，社會主義改革不可避免。然而，正如任劍濤的宏文所展示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進入了改革的軌道，最終就如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筆下的改革中的專制主義，難免從修修補補走向全面崩潰的宿命。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必然造就的反改革勢力，國家不崩潰就很難使之消褪。

金秋送爽，我刊編委會又迎來了五位新的編委，即耶魯大學金融系陳志武教授、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秦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任劍濤教授與張鳴教授和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趙鼎新教授。